

# 高唐“旧城”复名为“清平”的背后

你所不知道的聊城

□ 闫西龄

约在1989年10月,我代表聊城地区教育局到青州参加省教育厅召开的全省电化教育会议,当时“青州”刚由“益都”改名而来。我由此想到:高唐县的“旧城”也应复名为“清平”。

我的出生地虽属茌平县,但离清平仅六七公里。我外祖父家就在清平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1956年,清平县建制被撤销。大部分地方划归临清,少部分划归聊城(即目前的东昌府区),原清平县县城划归高唐县,降格为清平区(当时每县划分为若干个区)。

不知从何时起,清平区改名旧城区,后来又叫旧城人民公社。“清平”这个名字,渐渐湮没在岁月里,鲜有人提起了。

我决定利用大会晚上的空闲时间,给高唐县人民政府写封建议信,题目为《应将“旧城”复名为“清平”》,并列出具

条理由:

(1)按理说有“新城”才有“旧城”,新城在哪里?既然没有新城,为什么把清平改称旧城?把清平改称旧城是没有根据的。

(2)清平县有上千年的历史。“清平”取“政治清明,百姓平安”之义,是一种祥瑞用语。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景。

(3)清平县城里有些建筑、单位很有影响,很值得纪念。例如东城门(即迎旭门)是目前鲁西仅存的古城门,堪称鲁西一景,多次成为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再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清平师范学校很有影响,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该校面向全省招生、分配,我大姐夫就是该校1957年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滕县某小学任教。

(4)当前(1989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中仍写的是“清平”,没写“旧城”,说明在国家层面,也是认可“清平”这一称谓的。

著名学者、学界泰斗季羨林先生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都写道“我是山东清平县人”,从来没提到过“旧城”。

总之,我(誉写为正式信件时改为“我们”)强烈希望贵县将“旧城”复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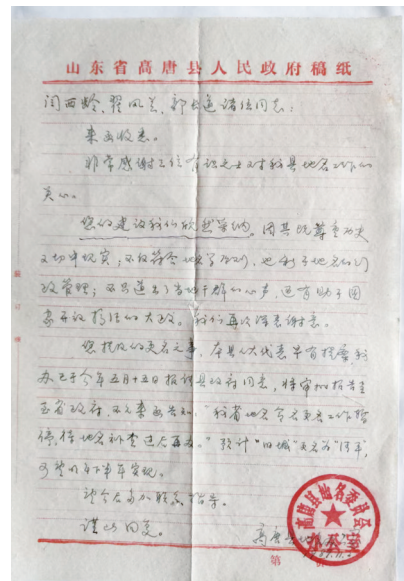
“清平”。

写完草稿,我又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便把我爱人翟凤兰的名字写上,又将在聊城地区师范工作的郭长道同志的名字也写上,因为他是高唐人且是清平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事我没来得及告诉郭长道,因为他不久之后病故了)。

信发出后不久我便收到了高唐县地名委的回复:“非常感谢三位有识之士对我县地名工作的关心……您三位的建议我们欣然采纳。”并说明,目前省里要求地名的命名、改名以及恢复原名等工作暂停,需等全省地名普查结束后才能进行。届时,我们一定尽快办理,你们将“旧城”复名为“清平”的愿望定能实现。

1991年9月,我收到了高唐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县政府已将“旧城”复名为“清平”。您三位的建议实现了,感谢三位对我县地名工作的关心。

将“旧城”复名为“清平”,不仅是名称的更改,更是一次文化正名——重新接续了断裂的历史脉络,唤醒了集体记忆,最终凝聚成一份深沉的地方认同。



高唐县人民政府给作者的回信

从“清平”变为“旧城”,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从“旧城”复名为“清平”,则是历史记忆的接续——它见证了一座千年古城的重生。

## 一只小药箱

口述

□ 邓兆全

我家书橱的角落里,平躺着一只老旧的木质药箱。箱体是红褐色的原木,十字是铁皮箍上去的,边角被摩挲得光滑温润。药箱上深浅不一的纹路和几处磕碰的痕迹,见证了岁月变迁,承载着许多过往的故事。

这是爷爷留下的物件。听父亲讲,1944年春天,八路军肖华支队开进鲁西地区。一支小分队曾在我的老家茌平县郝集乡(今茌平区乐平铺镇)佛堂村驻扎过一段时间。我爷爷是支前民工队长,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扭伤了腰,八路军小分队专门派卫生员到家里给他疗伤。没过几天,小分队有任务紧急开拔,卫生员把药品连同小药箱一同交给我奶奶,教给她如何敷药、如何护理后就匆匆离开了。

没过多久,爷爷的伤病痊愈了。他一直期待着那位八路军卫生员回来,好把小药箱还给人家。谁知这一等就是32年。1976年秋天,爷爷去世了。临终前他把小药箱交给我父亲,让他有机会帮他完成这个心愿。从此,这个小药

箱就保留在我们家里。父母先后几次搬家,也淘汰了许多家具,但始终没有丢弃这个小药箱。

父亲是一名教师。1949年8月在聊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我从记事起,就发现父亲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医学方面的书。1981年5月他离休后赋闲在家,开始用中药材配制一些液体药剂,并将其装在瓶子里。瓶子外边贴着标签,写着治疗疱疹、烫伤、冻伤的字样以及使用方法等。那些药瓶子就集中放在爷爷留下的那个小药箱里。

全家人开始都觉得难以理解。直到有一天,同村一位70多岁的李忠成大爷,得了带状疱疹。他白天疼得坐立不安,晚上更是难以入睡,又拿不出钱去医院,只能干受着,疼得实在忍不了了,就在村里到处跟人诉苦。父亲看他痛苦的样子,对他说:“大哥,我有个偏方,你试试。”

李忠成大爷敷用了几天药水,果然见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他腰部的带状疱疹都结了痂,也不疼了。此后,村里

人都知道,父亲不仅会教书,还会看病。

那时候的农村,交通极不方便,去乡镇医院看病要走几公里的土路。村民生了病,多数选择硬扛,小毛病拖成大病是常有的事。知道父亲会看病以后,村里一些人感觉身体不舒服就来找父亲。父亲对皮肤病颇有研究,觉得有把握治疗,就从小药箱里拿出药瓶子,给患者当场涂抹,基本上几次就见效了。父亲从没有收过病人的钱。他常对母亲说:“我配的药大多是就地取材,成本很低,花不了几毛钱。”那时上小学的我,在父亲的要求下,没少弄些蚯蚓、土鳖,知了啥的,可能都做了药材了吧。

有些人病好了以后,心里过意不去,就会带点土特产来我家表示感谢。父亲便把自己种的瓜果和新鲜蔬菜回赠给对方。这样一来二去,很多不太熟悉的人成了礼尚往来的好朋友。

父母是1998年春节来县城和我们一块居住的。搬家的时候,让父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个不起眼的小药箱。之后好几年,村里还有人到县城来找父亲,讨要治疗带状疱疹的偏方。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爸,国家规定,没有行医资格不能给人看病,否则就是非法行医。”父亲听后沉默了很久,好几天都不跟人说话。从那一天起,他再没有给人



作者家中的小药箱

看过病。后来也有人来问过偏方的事,都被他婉言拒绝了。那些药水,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只有爷爷留给他的那个小药箱,一直安静地放在家里大衣柜的角落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和母亲住在一起。搬了两次家,也搞了两次装修。原来的家具早就换得差不多了。有一次妻子对我说:“那个木箱子也扔了吧,没啥用,还占地方。”我笑着对她说:“你以为那是个空箱子?那里面装着爷爷的承诺与守信,装着父亲的无私和善良。我们也该往箱子里装点东西,然后传给儿子,再一代代传下去。”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